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三年

第三十六號至第五十一號

第二六一次會議至第二七六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至三十一日

紐約

目次

	頁次
第二百六十一次會議	
一。臨時議事日程	1
二。通過議事日程	1
三。緬甸申請加入聯合國案	1
四。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
第二百六十二次會議	
五。臨時議事日程	4
六。通過議事日程	4
七。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4
第二百六十三次會議	
八。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6
第二百六十四次會議	
九。臨時議事日程	20
一〇。通過議事日程	20
一一。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20
第二百六十五次會議	
一二。公報	29
第二百六十六次會議	
一三。臨時議事日程	30
一四。通過議事日程	30
一五。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30
第二百六十七次會議	
一六。臨時議事日程	35
一七。通過議事日程	35
一八。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35
第二百六十八次會議	
一九。臨時議事日程	40
二〇。通過議事日程	40
二一。智利常任代表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事件之來函	45
第二百六十九次會議	
二二。臨時議事日程	49
二三。通過議事日程	49
二四。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49

(目次續見背封面裏頁)

第二百七十二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午後二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蔣廷黻先生(中國)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阿根廷、比利時、加拿大、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敘利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二九。臨時議事日程 (文件 S/Agenda/272)

- 一 通過議事日程。
- 二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二日智利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祕書長函(文件 S/694)。

三〇 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三一。繼續討論智利常任代表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事件之來函

經主席邀請，智利代表 Mr Santa Cruz 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Mr ARCE (阿根廷) 智利代表提議請捷克斯洛伐克駐聯合國前任代表說明他之所以採取我們都知道的那種態度的理由以及引起智利政府提出控告的事實。我贊成此項請求，因此這個請求之提出即可符合理事會議事規則。

阿根廷的傳統政策是尊重其他國家的內部組織。我們現在請求採取必要步驟以闡明這個問題，並未改變我們的態度。反之，我們認為如此即可促成坦白的討論並可改善目前緊張的國際局面下各大國間的關係。

鑒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對此事的反應，我認為最宜闡明實情以期完全消除可能發生的任何誤會。

敵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及捷克斯洛伐克都保持着正常的外交關係，當然與安第斯山外的鄰國有最和睦的關係。

智利的指責目的在求闡明事實，我們的鄰國之所以出此是因不久以前那個共和國內發生其他事件而生的懷疑。

我們無理由預先判斷這個問題的曲直。如果理事會的討論表明智利所懷疑懼都無根據，蘇聯代表可放心，我們決不會不維護他在提到憲章第二條第七項時 [第二六八次會議] 所引述的“不干涉”原則。

Mr IGNATIEFF (加拿大)。加拿大代表團贊成廷阿根代表所提出的請求，也認為

安全理事會應依照暫行議事規則第三十九條表決邀請 Mr Papanek 供給情報。安全理事會既已決定將智利代表來函列入議程並予考慮，敝代表團即覺得安全理事會的正常程序是聽取 Mr Papanek 陳述以便已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嚴重控告者有機會以具體事實證明其控告，而且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也有機會予以反駁。

Mr TARASENKO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我代表烏克蘭代表團對於阿根廷代表提議邀請 Mr Papanek 參加安全理事會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一事，提出極堅決的反對，其理由如下。

一個重要的機構通常的慣例是不討論一個賣國賊所提出的反對其本國人民與污蔑其本國的控告。若讓這個人有機會污蔑並控告其本國人民，那就是對於該國的一種侮辱，尤其是因為這個人並無職位，且因為是賣國賊而被其政府撤職。

倘若安全理事會接受這個提議，這就不是一個旨在加強聯合國力量的步驟。為聯合國利益計，即不應讓這種人有機會來此對其本國人民發表誹謗的言論。

因此，我極堅決地反對阿根廷的提議。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我對於邀請捷克駐聯合國前任代表參加理事會的討論一事的態度是依據蘇聯代表團對這整個問題的一般態度而定的，這個問題是智利政府及事實上支持該政府者故意造成而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

我們認為准許捷克駐聯合國前任代表到安全理事會來發表完全無根據與誹謗其本國人民及其本國的言論，是錯誤的。安全理事會對於這種言論，無論在何時發表且無論為何人所發表，不僅不應予以鼓勵，反應加以譴責。

因此，我堅決反對智利、阿根廷及加拿大三國所主張的邀請前任捷克代表參加安全理事會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的提議。

主席 安全理事會現即表決智利代表團邀請捷克駐聯合國前任常任代表 Mr Papanek 參加討論的提議。

舉行舉手表決，該項提議以九票對二票通過。

贊成者：阿根廷、比利時、加拿大、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敘利亞、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反對者：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經主席邀請，Mr Papánek 就理事會議席。

自此時起用即時傳譯辦法。

Mr PAPANEK 請讓我首先感謝安全理事會主席及各位理事准許我將捷克斯洛伐克案件提請考慮。我承認我於本年三月十日致函秘書長〔文件 S/696〕時，原希望得此允許。雖然我沒有請任何人提出自由捷克的問題，但智利政府及其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Mr Santa Cruz 率先提出，實係敵國人民與我個人永遠感激之舉。

差不多是九年以前的今天，德國以武力佔領捷克的案件提請國際聯合會注意。那時 Benes 總統提出的抗議因被視為個人抗議而被倉卒拒絕。今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給我一個陳述的機會，我很感激，且願對阿根廷及加拿大兩國代表支持准我陳述的提議，表示感謝。

我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致秘書長函中請求安全理事會調查捷克境內共產黨徒所發動的政變。我在該函中祇概論當時所發生的事實並且簡述在篡位者最初幾天的統治下，捷克原有制度已發生如何變動以及捷克人民如何受累。

為明瞭實際情形起見，須要追述造成目前變故的過去事實。過去三年中捷克人民為求保存民主與自由的最後痕跡所須對付的種種困難，與捷克因處於歐洲中心為戰略上重要地點所時常遇到的困難相似。捷克人民原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擊敗希特勒納粹法西斯主義者統治世界的企圖獲得偉大勝利以後，他們所遇的困難即不復存在。

幾百年來捷克人民與歐洲最進步及最發達的國家在最前線並肩作戰。他們是戰鬥中的先鋒隊——我是存心用這個名詞——他們所爭求的是自由、人道、民主和社會正義。“真理不滅”始終是他們的箴言，捷克共和國創國元勳 Thomas G. Masaryk 以此為格言，正如五百多年以前 Jan Hus 一樣。這種鬥爭實在是捷克歷史上所有偉大人物及所有捷克政治領袖所維護的本國政治傳統。

捷克解放後於一九二〇年以民主方法採行的憲法就是根據這種自由與正義的理想。

而且這是一種現行切合實際而且妥善的憲法，直到一九三八年為暴力所廢止。因此，Benes 總統於一九四三年在美國國會演說時實有理由表示戰爭獲勝時，捷克必能再迅速重建其古老的祖國，且將永遠忠於民主生活方式、精神自由與宗教自由原則以及和平理想與國際合作共求和平的理想，一如在其長久而光榮的歷史過程中所保持的那種忠實精神。

或者大家會問我何故談到這一點。我提到這一點是因為我確認捷克本國的歷史傳統不能一旦改變。我認為一個經過幾百年磨煉的民族精神不能在幾小時、幾天或幾星期之內根本改變。這種變化的發生——現在似已發生了這種變化——不是由於有人所說的人民的精神與意志改變了，而是由於蘇聯所支持的少數共產黨徒的暴力所致。這是國際和平體系中的一個裂痕。這一點我希望能向安全理事會各代表證明。

破壞捷克民主政治的計劃在本年二月事變以前老早已經開始。此時回顧過去，顯見蘇維埃共產黨的計劃在戰爭結束以前就已確定。顯明的，共產黨徒開始所謂與 Benes 總統及本國非共黨分子合作以來，其每一動作都是為了在捷克的內政方面最後破壞民主生活方式，而在外交方面則完全服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德國佔領期間，捷克人民希望於解放以後可以繼續他們於一九三八年被迫停止的建設工作。倫敦的捷克政府於回返布拉格以前，業已擬定一個政治與經濟計劃，保障自由、民主和社會正義，並對所有工作人員予以更大的社會福利。

捷克政府於解放以後準備接收捷克最東部地區——即是喀爾巴阡俄羅斯——行政時，發生了意外的困難。倫敦政府於蘇聯軍隊解放該地以後不久即派捷克代表團到喀爾巴阡俄羅斯去並於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到達該地。雖然毫無疑問地喀爾巴阡俄羅斯依法為捷克共和國的構成部分，但蘇聯軍司令部自始就不容許這個代表團與人民接觸。

蘇聯特務組織官員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五日開始組織喀爾巴阡俄羅斯人的會議，以求強迫他們同意將喀爾巴阡俄羅斯歸併於蘇聯。

捷克代表團的任務之一是在該地籌辦徵兵事宜、執行倫敦的捷克政府的命令，並且發出捷克軍隊動員令。可是，蘇聯軍隊同時

已開始招募喀爾巴阡俄羅斯人加入蘇聯軍隊，捷克代表團的軍事代表團因此即無法發出動員令。他們逮捕執行動員令的捷克官員，而且蘇聯軍隊的司令官 Commissar Mechlis 聲言捷克政府代表團與捷克軍隊司令部都在從事不利於蘇聯的活動。蘇聯軍部不准他們接觸喀爾巴阡俄羅斯人民及喀爾巴阡俄羅斯國民參議會，而且不准捷克代表團在該區域內自由移動。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蘇聯軍事組織於國民委員會舉行會議時到達該地，但不准捷克代表團參加這次會議。他們強迫解散國民委員會，這些委員會都是自動組成的而且毫無問題地都贊成喀爾巴阡俄羅斯仍屬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這些委員會的委員都被驅逐到蘇聯而不知下落。

由於蘇聯軍事機關的此種舉動並在其直接干涉之下，喀爾巴阡俄羅斯人民雖然大多數都主張該地繼續為捷克斯洛伐克構成部分，但該地終究脫離了捷克共和國。

幾個月以後，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內，Eduard Benes 總統及政府若干官員都被請於回返布拉格以前去莫斯科一行。當時對於去不去的問題討論了很久。假如去就可設法與蘇聯政府所支持的並在 Klement Gottwald 及 Zdenek Fierlinger 領導下的共產黨團體達成協議，假如不去該地即有設一新政府之虞，而這個新政府當會完全排斥倫敦政府，戰爭期間其他各國在倫敦設立的政府都遇到過這種情形。我國人民與蘇聯人民有幾百年的友誼關係並對斯拉夫老大哥具有信心，捷克政府覺得鑒於國內人民對於蘇聯人民的此種友誼，他們不得不到莫斯科去。

倫敦的捷克政府到達莫斯科時，戰後捷克的基本計劃即經破壞。共產黨員立即強迫他們接受所謂 Kosice 計劃，並威脅說若不接受該計劃，決不容倫敦政府回返捷克。當時 Zdenek Fierlinger 說他們如不接受莫斯科團體的要求，載運他們回國的“火車即不開行”。不錯，Benes 總統確仍然為總統，而且斯大林總理還重申他於一九四三年簽訂友好條約時向 Benes 總統所作的保證，即捷克可自由決定如何處理其內政，其外交政策則依照蘇聯的政策。

但他們強迫以 Zdenek Fierlinger 為新政府總理。同時以 Klement Gottwald 及 Vilam Siroky 兩共產黨員為副總理。所有重要部長

職——內政(警察)，教育，新聞，社會福利及農業都由共產黨員擔任。國防部長職派與 General Ludvik Svoboda 擔任，據稱他無政治關係，而是蘇聯造成的蘇聯境內捷克陸軍部隊的英雄司令，而且完全是共產黨及蘇聯一手造成的人物。

Jan Masaryk 仍為外交部長，但新任次長則為自幼即係共產黨員的 Vladimir Clementis。

那時他們不敢消除 Benes 總統，因為他們不確實知道如果沒有 Benes 總統，國內人民是否會接受他們。Benes 總統親自對我說在相當長久的時間內，尤其在 Kosice，蘇聯的武裝兵士使他與外界不通消息。

可是，莫斯科組成的內閣清楚表明這不過祇是一個臨時政府而已，到了布拉格解放並在首都成立政府時即不復存在。布拉格內，凡曾擔任解放工作並在佔領期間與德國人作戰的捷克國民解放委員會領袖都經 Kosice 政府授權為其代表。倫敦的捷克政府及 Kosice 政府先後都曾對布拉格捷克國民解放委員會保證，政府回到布拉格後即將改組，新內閣將容納所有反抗運動與國民解放委員會的代表。

然而，蘇聯大使 Valerian A. Zorin 隨同政府自莫斯科返捷克後，於一照會中堅稱蘇聯政府要求取消容納捷克國民解放委員會所有領袖之議，因為他們都不可靠。原負布拉格軍事抵抗納粹之責的 General Kutelvasr 被撤職了。委員會主席 Prazak 教授被蘇聯特務審問，實際上委員會的全部主席團都被撤職。Kosice 政府並未實行改組。

Benes 總統在 Kosice 被幽禁之時，Jan Masaryk 正在金山參加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他受到蘇聯代表團團長 Mr. Molotov 極大的壓迫與威脅，那就是說，如果 Masaryk 不聽他的命令，他即與 Masaryk 斷絕關係。

為求與蘇聯保持友誼起見，亦須在經濟方面作重大犧牲。紅軍與西方各國盟軍不同，紅軍堅持要求捷克政府付出它所有的費用，這些都照付了。甚至於在戰爭的直接善後問題均已解決以後，蘇聯仍繼續在經濟上虐待這個小盟國。貿易協定的談判在極大的壓迫下進行，捷克代表團時常不得不承諾一些無法履行或者無疑地有損本國的義務。

捷克政府被迫承諾的事項之一是由蘇聯接管 Jachymov 境內的鑛鑛，過分慷慨的 Zdenek Fierlinger 未通知政府即允許他們接

管。後來政府不得不正式批准此約，自此以後捷克當局即不能進入鐵區，亦不能得到任何關於鐵區的消息。防守鐵區的衛兵雖着捷克制服，但都是外國國籍。在接近德國邊境美國區與蘇聯區交界處的 Karlovy Vary 有幾個旅館專由蘇聯軍隊經營與使用，蘇聯的高級軍官與政府官員時常在那裏停留。

我之所以列舉這種事實是因為這些事實與一九四八年二月的事變有直接關係。我還可在此列舉許多其他事實，但此時我祇擬提及一件事，在上月所謂事變高潮時也曾發生同樣的情形。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原定為捷克普選的日期，蘇聯駐維也納總司令部通知捷克政府稱蘇聯駐奧地利、匈牙利及德國的軍隊將有調動，須自五月二十四日起經過捷克領土。這是舉行普選前兩天的事。當時外交部長 Jan Masaryk 及 Benes 總統先後表示反對，世界輿論亦極不贊成，於是那時恰在 Karlovy Vary 療養的 Marshal Konev 宣布軍隊的調動延至五月二十七日。

本年二月內，未經宣布亦無任何消息，又有同樣計劃的軍隊調動經過捷克領土，我隨後再講這件事。

捷克戰後經濟建設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全國曾盡其一切可能力量以求儘速恢復其以前較高的生活程度，因此馬歇爾計劃公布時，全國極為重視並寄以重大希望。

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捷克政府一致決定並正式宣布捷克擬與其他被邀請的國家共同參加巴黎會議。那時波蘭政府的代表團正在布拉格，其團長為外交部長 Zigmunt Modzelewski，波蘭代表當與捷克方面共同決定接受邀請而赴巴黎。波蘭代表擬於回到華沙以後再宣布接受邀請。但後來一直未宣布接受。

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Gottwald 總理，外交部長 Masaryk 及司法部長 Drtina 都被邀請到莫斯科。斯大林總理本人命令 Gottwald 總理說捷克的內閣必須在幾小時內推翻它一致表決的決定。

Gottwald 總理通知布拉格代理總理並請他為此目的召集內閣非常會議。Mr Gottwald 發出這個命令以後才把這種轉變情形通知在莫斯科的 Mr Masaryk。因為內閣中若干非共產黨員未參加會議，所以這種轉變就更為容易。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宣布取消以前的決定。宣布時所作的解釋說捷克的參加將會被視為對蘇聯不友誼的舉動。

這一次又是蘇聯的政治利益在捷克的經濟需要之上。捷克人民知道這個決定時，極感遺憾、憂慮而甚至於驚慌。難道這不是蘇聯在干涉捷克主權國的事務嗎？

我在談論上月事變以前，願意簡述在幾個月之前，即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曾有同樣政變的企圖。那時共產黨員捏造了一個對斯拉夫民主黨不利的事實以求證明這一黨的領袖都在共謀破壞共和國。他們盡力設法使這個重要黨派成為非法黨派，並以共產黨員所控制的工會和各黨派人員代替政府中的民主黨黨員。如此共產黨員即可完全控制內閣。可是，這個企圖失敗了，而且這次失敗以後差不多立即又受到另一次挫折，因此他們在內閣與議會中的勢力就大為衰落。

社會民主黨在 Zdenek Fierlinger 的領導下直到那時為止都聽從共產黨員的命令，可是自彼以後即不再服從他們，並將其主席 Fierlinger 撤換。那時共產黨員必已知道他們以憲法和議會方法在捷克取得最高權力的機會已經完全沒有了。從那一天起，緊張與恐怖的情況也日益加強一直到二月中事變的日子。

我不擬花費安全理事會的時間來形容共產黨政變是如何發動的。這是最近發生的事，大家仍然清楚記得。種種事實都是大家知道的。全部所謂事變的開始是由於共產黨員內政部長 Vaclav Nesek 拒絕依照行政院的决定來檢討與改變祇委派共產黨員担任布拉格警察廳最高職位的政策。其他各政黨的部長不能接受這個不合憲法的步驟，因此全體呈請辭職。共產黨員抓住這個藉口而實現其謬謀已久的計劃。

確實的，如果二月中共產黨員沒有這次機會，稍遲一些時日，在五月中舉行普選以前他們必然會找出這種機會的。這種事一定會發生，其原因如下

Gottwald 總理在幾個月以前宣言共產黨員將得選票百分之五十一以上。那時既已顯見共產黨員不會得到這樣多的票數，所以 Gottwald 的話是說政變早經計劃與準備好了。情報部長 Vaclav Kopecky 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在 Brno 共產黨會議中說

“情勢發展到現在，我們必須有一個新的或革新的全國陣線，由左派進步的社會主義

分子領導，因為他們願意領導全國並且對於社會主義的目的採取積極的態度”。

所有非共產黨黨派都批評這次演說並且說它表現共產黨希望得到百分之五十一多數的方法。

政變必須發生，因為顯明的，共產黨不僅不會在選舉中得到多數，而且會受到損失其結果共產黨在中歐和東歐其他國家的勢力也會衰落。共產黨和蘇聯都不能容許在那個時候有這種政治情勢發生。是否有人能說蘇聯不注意選舉的結果 或者有人聲言即使捷克全國願以自由及無記名選舉方法多數推選共產黨，還需要政變？

過去幾星期內在捷克常有人說政變是人民意志的表現。我斷言凡為擁護 Gottwald 總理的不合憲法的要求而參加罷工及遊行示威者不僅是受到欺騙而且實際上是強迫參加的。他們就是以前在德國佔領期間同樣的恐怖狀態下，於賈國賊 Meravec 講話時，遊行示威反對 Benes 總統的所謂捷克人民。凡未服從共產黨命令參加全國於正午舉行的罷工者都失去工作並將受到其他懲罰。這是一個確切的事實，任何調查團均可毫無疑問地予以證明。

遊行或示威運動的參加也是強迫的，在美國現在就有證人可以證明高級官員與打字員被迫在蘇維埃旗幟下遊行時都同樣痛哭。人民聚集反對政變的真正自願表現比報載的情形更多，却立刻受到壓制，軍警驅散人民，不准他們出聲。所有新聞、報章和無線電廣播機構都立即由共產黨員掌握，除共產黨以外，無人能廣播——甚至於共和國總統也不能說話，雖經宣布幾次說他將發表演論，但從未發表。我知道他擬好一篇演說詞，但管制者不准他廣播。我知道他將其他兩篇演說錄音，共產黨員還是不能接受，不准廣播。

所有非共產黨黨派的公開宣言都受禁止，這一點差不多用不着再說。各黨派的黨部都被武裝民團接收，其本身選出的首領都經撤換，由聽從共產黨指揮的新領袖接替。非共產黨的報紙若不撤換其編輯並另派順從的人士擔任，即不能得到紙張的分配。凡反對政變者立即被宣布為賈國賊，並遭受其一切後果。

現在請容許我研究捷克政變究竟是一個國內問題呢？還是蘇聯所造成的事件呢？

這次政變是由下列所謂捷克政治領袖操縱的：Klement Gottwald, Zdenek Fierlinger,

Vaclav Kopecky, Zdenek Nejedly, Rudolf Slansky 及 General Ludvik Svoboda。所有這些人，無一人例外，以及其他未提到的一些人，戰時都在蘇聯受到必要的訓練及其將來行動的明確指示。

捷克政變雖然由 Gottwald, Fierlinger 及其他人士設計與執行，但不能算是純屬國內的事件。共產黨實行政變時——從無數的照片證明——打着蘇聯以及捷克的旗幟，懸掛斯太林的像片，用蘇聯革命的標語，鐵鎚與鐮刀，並且把蘇聯的國歌與捷克國歌同唱。共產黨於採取任何暴力行動時經常都用這些標識。可是當它願意在自由而無記名選舉中得到捷克人民的選票時却公開地而偽善地祇用捷克的國徽與標識。

如果我們一讀去年十二月出版的 Benes 總統的回憶錄，我們就知道甚至於早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留在莫斯科的共產黨員已強迫總統接受各種原則，例如設立全國或行動委員會來決定可容許成立那些政黨以及決不能再容許那些政黨成立——這些基本原則都與捷克的傳統及憲法相悖，但與蘇維埃主義完全相合。所有新定的經濟和政治制度都倣倣蘇聯。言論、新聞與集會自由以及對於基本人權的保護已不復存在。

捷克今日是一個恐怖的警察政體國家。甚至於人人的思想都不容不依照命令，所有科學家、教授、音樂家、劇人和藝術家都不能例外。所有這種種統治實非偶然。這正是倣倣蘇聯的方式，完全不顧傳統、歷史或甚至捷克人民的利益。

現任外交部長 Clementis 曾指明捷克整個外交政策必須更進一步配合蘇聯的外交政策，教育部長 Nejedly 對於捷克學校所說的話完全也相同，並說學校現在應該是滿足國家需要的政治工具。政府的其他部門，尤其軍部，也是如此。

如果這只是捷克內部的改變，是否需要如此像奴隸似的模仿蘇聯的方式？

我斷言所有這一切都證明捷克受了蘇聯的間接侵略，是政治滲入的犧牲者，這正是 Mr. Molotov 於一九三九年承認與直接侵略同樣危險的那種間接侵略。那時與英聯王國和法蘭西談判聯盟期間，他寫道所提議的條約將適用於“直接或間接侵略，所謂間接侵略就是對於侵略者有利的一種內部政變或政治改變”。

關於這一點，我還可以引述另一段提到政治滲入的文字。前任美國國務卿 James F. Byrnes 於其所著直言 (Speaking Frankly) 一書中第三〇六頁有下列一段：

“聯合國憲章規定各會員國不得以威脅或武力侵略任何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這項規定不限於武裝侵略，而亦適用於威逼、壓迫或詭計，如政治滲入。”

除了蘇聯的這種間接侵略與政治滲入以外，尚有上月直接干涉捷克內政的事例。

通常外國政府官員的正式訪問都預先正式通知各部負責首長或國家元首。蘇聯外交部副部長 Valerian Zorin 於一九四八年二月正值政治緊急時期到達布拉格，事前並未通知外交部長 Jan Masaryk 和總統 Eduard Benes。等到大家都知道他到達布拉格以後，他表示此行有兩個理由。第一，他是來管制從蘇聯運來的麥與畜料的分配，第二，他是來參加捷蘇友誼協會的會議——這是外交部副部長訪捷的兩個重大理由。可是事實上他之來是為了批准共產黨員的計劃並指導共產黨首領的行動。他與所有共產黨部長及 Zdenek Fierlinger 會商。有許多證人都可證明這個事實，這些人現在德國境內，正在準備前赴巴黎。

Mr. Zorin 抵達布拉格以後，總統 Benes 召見總理 Klement Gottwald。他們談話差不多兩小時以後，Gottwald 預備離開時，總統原已非正式知道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到達布拉格，就問總理“你今天再沒有什麼事告訴我嗎？”Gottwald 回答說“沒有什麼事。”主席又問“Mr. Zorin 在布拉格的事也不告訴我嗎？”Gottwald 即回答說“是的，他在這裏。”蘇聯的這樣一位高級官員來訪，他竟然一字不提，這更足以證明 Gottwald 是在為那一國的利益服務。因此，後來總統完全拒絕接見 Mr. Zorin。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總統 Eduard Benes 將他對於共產黨的有關解決緊急政局的要求所作的答覆遞交總理 Gottwald。這是致捷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一封信，其文如下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你們給我一封信，把你們對於解決緊急政局的見解告訴我並且要求我採納。

“請讓我說明我的態度。我深感在此民族與國家存亡攸關之際責任的重大。從緊急局面最初開始時起，我一直在思考當前的局勢，

局勢的演變情形及其與世界局勢的關係。我所力求明白瞭解的不僅是現況，而且造成現況的原因，以及此項或彼項決定可能造成的結果。

“我清楚知道造成現況的重大勢力。我以鎮定、客觀而冷靜的態度，用切合實際的方法考慮目前情況時，感覺我國各派人民所共同希望於我的是求得和平與安寧，秩序與紀律，自願同意的紀律，進步的和真正社會主義的生活。

“我們如何能達到這個目的？你們都知道我真誠信仰民主。縱在此時我仍不能不忠於此項信仰，因為據我的信念，民主是一種合理而可尊敬的人類生活的唯一可靠而持久的基礎。我堅認一種議會的民主，一種議會的政府，乃是民主的條件。我可以說我很明悉如欲實行民主在社會與經濟方面必須如何，我是根據這種原則來從事我的政治工作，我如採取任何其他行動，那就是自欺。

“我們現在的民主危機祇能以民主和議會的方法解決。我並不是不採納你們的要求。可是，我認為所有我們的政黨在全國陣線下聯合起來，都負有政治責任。我們全體都已接受全國陣線的原則，直到事變發生為止這原則已經實行有效。在我看來，這次危機並未證明這個原則之不能實行。我相信我們能繼續保持大家為實施這個原則所必不可少的合作，一切爭端都可以最有利於國家及捷克與斯拉夫兩個民族的方式予以解決。根據這個理由，我曾與五個政黨商洽。我聽取他們的意見，有些已將其意見以書面向我提出。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我決不能忽視。因此，我必須再度籲請大家共同以議會方法在全民陣線下求得和解辦法與圓滿合作。這種種都是原則問題。

“就我個人而言，我已說過，我完全明瞭任總理之職者當須最強大政黨的首領，這就是 Klement Gottwald。

最後，從實際觀點言，我清楚知道社會主義是我們全國大部分人民所希望的一種生活方式。此外，我相信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以有相當自由與和睦。這種種都是我們整個民族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原則。我們的民族在其全部歷史過程中差不多不斷地在爭求自由。歷史亦已向我們表明不和的結果如何。因此，我迫切向你們要求 讓我考慮這種事實，把它們作為我們談判的根據。我們全體應該再度同意將來要永久合作，不要繼續將全國

分成兩個相爭的部分。我相信合理的協議是可能的，因為這是絕對必要的。”

任何人會相信假如沒有最大的壓迫、要挾以及使用武力的威脅，Benes 總統會同意 Klement Gottwald 主持下的新政府嗎？Benes 總統終身研究民主，為民主而工作，教導民主，為民主而流亡並且獻身於民主，難道他會隔夜改變嗎？Benes 總統可以接受那種改變捷克國內一切法律的恐怖與武力統治嗎？他讀到受控制的捷克報章上所載無數被監禁、看守和審訊的人士姓名時，能不痛心嗎？他能夠甚至默許那些違犯憲法條款和保護憲法權利的法律條款的行動嗎？他能夠容許他的一些最老和最好的朋友——流亡時的同事，他的合作者，因為與他合作而在德國集中營過了好多年——以及一般捷克國民，被撤職，被奪去財產，被無理囚禁並由所謂特別法庭審訊嗎？

我絕對不承認 Benes 總統現在是自由的。我決不相信他贊成 Gottwald 的新政府或者未受最大的壓迫而認可其行動。

我相信 Benes 總統如果是自由的，就會立刻辭職。我確實知道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星期六外交部長 Jan Masaryk 曾在 Sezimovo Usti 謁見他。我知道那天總統說他準備辭職。

我也絕對不相信故外交部長 Jan Masaryk 在最後幾天內說了那些話，除非他是在極大的壓迫與威逼之下才會如此。政變以後他的一切行動都有兩個特別衛兵看守。我不能接受官方所謂他的死是自殺之說。我知道他計劃離開捷克，再從頭為自由的捷克努力。

外交部長 Jan Masaryk 為求滿足蘇聯對於一九四三年友好條約的任意解釋，同時又要對其本國不作不可挽救的損害，他所須對付的種種困難極為重大，尤其在去年九月有人謀殺其性命未遂以後。另有兩內閣閣員 Drtina 及 Zenkl 與 Mr Masaryk 收到同樣的包裹，其中裝有炸彈以謀殺收包裹者。幸而三個炸彈都在沒有爆炸之前就被發現了。

隨後調查時，司法部發現這是共產黨要殺死捷克三個最孚衆望的民主領袖的陰謀。調查中又證明議院中共黨議員 Sosnar-Honrak 亦與這些謀殺者有關係，他有一個貯藏武器與軍火的地窖。因有這種種已經證明的事實，Sosnar-Honrak 不得不辭去議員職。蘇聯的特務組織亦經證明參與其事。

共產黨員接收以後不久，負責調查之責的司法部部長 Mr Drtina 被人發現倒在他的

住宅前面行人道上，奄奄一息。官方的解釋說他圖謀自殺。Jan Masaryk 是第二個官方公布的自殺者。Zenkl 還沒有自殺。

這種種都是事實。我有證人可以提出具體證明。我還有更多的事實。

我最初致聯合國祕書長函中提到政變之成功是由於蘇聯以其駐捷克西北邊境的軍隊威脅所致。我知道蘇聯的軍隊曾威脅總統，惟此項情報的來源我不能宣布，因為假如宣布出來捷克國內有許多人都會有生命危險。可是，我要求安全理事會聽取 Benes 總統自己的話，他說他被逼宣布接受 Gottwald 的獨裁，以免發生他所不能容許的流血慘劇。

自那時以後，我知道蘇聯軍隊在奧地利境內接近捷克南部邊境地方移動。現在我願意引述瑞士沮利克 Volksrecht 報所載一段消息的譯文。合衆社二月二十日維也納電稱。“奧地利消息靈通方面今晚告訴我們說過去幾天內另有蘇聯軍隊一萬八千人進入奧地利。這些軍隊的大部分（一〇，八〇〇人）將駐紮於維也納北部七十公哩處 Dollersheim。其餘從匈牙利來的軍隊將屯駐於維也納之西十五公哩處 Klosterneberg。”這兩個市鎮極接近捷克邊境。

其他報章消息中也提到那時蘇聯軍隊的移動。世界報章所載照片中也可看見蘇聯軍隊在事變期間參加布拉格的遊行示威。再者，蘇聯軍官參與逮捕非共產黨政治領袖。蘇聯的特務在管制警察與保安隊的內政部中工作。布拉格街上武裝民團中也有蘇聯特務。有些目覩這種種事實的人現在或在德國，或在赴巴黎及倫敦途中，他們有電報給我，說願意為這些事實作證。

我確認捷克境內的情勢及其繼續存在是憲章第三十四條所指對於國際和平及安全的威脅。

任何地方有暴政與壓迫情形存在，都是對於和平的威脅，尤其在歐洲的這個東方與西方接觸而且時常發生衝突的地方。

捷克境內已經充滿恐怖，這比東歐各國的恐怖情形更加厲害，因為使一個真正民主國家的人民有慣於奴隸生活，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很困難的。

由於這種恐怖，逃離家鄉的人民愈來愈多，其中有些是捷克政治、經濟和文化界的最好代表，但其中也有布拉格新恐怖政權的危險特務分子。

捷克的政變成功對於全世界共產黨的勢力是一種新的激勵，尤其在歐洲。這種情形祇會造成暴亂與衝突。

捷克境內情勢不祇是單純的內政問題而已，我們從美國、英聯王國和法國對於布拉格政府提出的正式抗議、法國外交部長 Mr Bidault、杜魯門總統及國務卿 Marshall 以及今天纔發表，英國首相 Mr Attlee 諸公的公開言論，都可證明這一點，我還可列舉其他人士。

可是全世界輿論對於捷克政變所表示的這種抗議與憤慨雖令人感激，却不是補救捷克情勢及防止其他各國內類似演變的積極行動。對於捷克之喪失自由只表示惋惜是不夠的。侵略者憑恃他的力量，於相當時期內鞏固其新得地位後，不久就會發動進一步的侵略。

捷克境內共產黨政變成功後幾小時內就已表明世界革命與統治的計劃不僅包括斯拉夫民族而已。南斯拉夫的 General Maslaric 於政變期間治與蘇聯的 General Gundarov 同在布拉格，他於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全斯拉夫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說

“沒有人否認世界已分為兩個陣營 帝國主義的陣營以美國為首，由英聯王國和法國輔助，民主的陣營是由蘇聯、斯拉夫與非斯拉夫人民民主國領導，並包括所有其他爭求自由與獨立的被壓迫民族。此外美國工人正在爭求其物質生活程度之不降低，美國農民正在爭求其產物價格之不異常低廉，美國黑人正在爭求與其他美國公民享受相同的權利，還有英國、法國和義大利工人及農人都在為自身生存作艱苦奮鬥，他們也都屬於民主陣營。民主陣營中並有希臘、印度、馬來亞和中國人民。民主陣營是一個巨大的力量，而帝國主義的陣營則是在美國華爾街大企業家領導下的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一羣帝國主義者的組合。”

General Maslaric 說西方攻擊新斯拉夫運動是無用的，他說這個運動與種族主義或從前的泛斯拉夫主義毫不相同。據他所說，這個新斯拉夫運動的主要任務是鞏固民主陣營，抵抗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

全斯拉夫委員會二月二十八日在布拉格舉行的最後一次會議中，蘇聯代表 Polevoj 宣讀一個決議案，其中有一段稱

“複雜的國際局勢需要全斯拉夫委員會及各國斯拉夫委員會作更大的努力以求我們

國家內最廣大的工作人民參加它們的工作。本會議欣悉與非斯拉夫新民主國家，即羅馬尼亞、匈牙利及阿爾巴尼亞，已有密切聯繫”。

三月十五日，新貿易部長 Antonin Gregor 在布拉格一個國內貿易組織的代表會議中說“我們卒能克服一切障礙並且擊敗反動勢力，必須感謝我們的斯拉夫盟國，主要的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這是公開承認蘇聯協助組織政變。

我深知情勢的嚴重並且完全明瞭我的行動的重要。我的行動是為捷克人民謀最大的利益。我覺得不得不實踐我在我的上司 Jan Masaryk 於去年十一月離開美國時對他所作的諾言。我說在他不復能採取行動以後，我必立即進行我的任務。

我的生活全部獻身於我的國家。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它的獨立而作戰。那時我被稱為賣國賊且受當地奧匈當局的譴責。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與總統 Benes 合作共求捷克的解放。我第二次被稱為賣國賊並受 Tiso 傀儡政權的譴責。

我函請安全理事會調查捷克政變，於是我又第三次被稱為賣國賊，不過這一次譴責我的不是國內人士，而是國外的負責高級官員。

從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聯合國宣言簽字日起，我一直不僅以個人的身份而且以捷克代表的資格用全部精力和全部熱忱來實現聯合國的宗旨與原則。我的努力是你們大家都知道的。

我鄭重聲明聯合國的成功是我的終身目的，因為有了和平我國人民才有進步，我的國家才有安全。我聲明我參加聯合國各機關的一切會議時，總是真誠盡力謀致諒解與協議。這都有事實為憑。

我從前相信捷克既為聯合國會員國，即可以其獨立國的地位處理本國事務。我承認我在過去幾個月內對於這一點日益感到懷疑。感到懷疑者還不祇我一人。

Benes 總統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出版的回憶錄第三六四頁上討論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所締友好、互助及戰後合作條約的一段列有一項附註。這個附註的譯文如下“我的判斷與期望是否錯誤？祇有將來才能答覆這個問題。無論是正確或錯誤的，我在當時實具有最真實的信心與誠意。”對於這問題的答案想不到是這麼快。

我親身看見我們所信任的大盟國侵害捷克的獨立，這是我一生所感受的最大震駭。

我現在祇有一條路可走，就是請安全理事會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及第三十四條的規定，調查捷克境內威脅國際和平及安全的情勢。聯合國的責任極為重大。我對聯合國具有信心，相信聯合國不會而且必不致放棄愛自由的捷克人民，他們現在受着恐嚇、鎮壓和奴役。聯合國也不會而且必不致放棄歐洲及全世界其餘所有自由已被蹂躪而且現在處於危險境地的愛自由人民。

Mr Papanek 退席。

自此時起復用連續傳譯辦法。

Sir Alexander CADOGAN (英聯王國) 我相信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都願意極仔細研究我們剛才所聽到的聲明，我聲明保留於以後再表示意見的權利。此時請主席容許我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一般意見，以求就我個人及敝國政府知道的真正背景來談一談這個問題。

聯合國一會員國智利的代表請求——就我所知，以完全適當的方式——安全理事會調查智利政府根據捷克前常任代表於其在職時所提控告而作的控訴，其大旨謂聯合國另一會員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曾以武力威脅侵犯捷克的政治獨立。

我們討論將此項目列入安全理事會議程時，蘇聯代表說這種指控都是——這是他的話——“純屬捏造”，“純屬誹謗”，“完全無根據”，“完全荒謬”。

因此，我們有指控，也有反控，安全理事會應該盡其職責力求明瞭此事真相。

欲知這一類的問題真相當然不是容易的事。須知一國政府若擬干涉他國內政，鑒於憲章的各項規定必會留意掩蔽其痕跡。它在目前這個年頭當然不會公開進行，對於這一點我却要補充一句，在過去，我隨後再談過去的某些情形——或者由於技術尚未完全發展與改善的緣故——蘇聯政府的行動並未十分審慎。

安全理事會對於所提控訴自宜囑令提供證據。就我而言，我不自稱我握有絕對證據。我不知道——我無法知道——事變期間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在布拉格與他人可能有的會談經過情形。我不知道——我們都不容知道——Benes 總統和 Gottwald 總理的會談詳情，我祇看見他們會談的照片，我也不知道 Gottwald 總理用何種論據勸誘 Benes 總統接受他顯然反對的要求。Benes 總統可以向我們說明這

種種情形，可是自從最近政變以來，他似乎已經沒有任何公開表示意見的機會。

我們不能期望得到這種直接證言。可是我們並不因此而須負責估定這種指控是否屬實。

在這種情形下，單純的否認並不十分令人信服。我們不能忽略過去幾年內我們親眼看到的情形。蘇聯鄰國一個一個地都淪於無情的少數共產黨員統治之下。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世界各國內共產黨對於戰爭的態度相繼劇烈改變，這種情形證明這些黨都接受莫斯科的命令。環境與技術始終沒有改變。

人人記得 Mr Vyshinsky 訪問蒲加勒斯特時，至少是以不正當的方法強令羅馬尼亞接受 Groza 政府，Michael 國王雖曾使羅馬尼亞參加盟國方面作戰而有顯著功績，最後却因此而被迫退位。

我們在其他國家內已經看到同樣的過程，即組織堅固的少數人團體以奪取政權，肅清所有反對分子，取消一切民主制度，壓制一切正常自由，並且依固定型式建立一個警察國家。上月捷克所發生的事變，以前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匈牙利及波蘭等國內都已發生過。在所有這些國家內，除共產黨以外，一切黨派都已逐漸或突然消滅，因而破壞了以前在雅爾他所宣布的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神聖國際諾言。其中有些國家是在蘇聯軍隊佔領期內少數共產黨員奪取而鞏固政權。這種情形都是依照一種固定的型式，致令人不能不斷言其同出於一源。

在蘇聯佔領下的保加利亞，共產黨員也是首先參加農民黨佔優勢的聯合政府，Mr Dimitrov 與他的少數而組織極嚴密且自蘇聯歸來的團體於是排擠保加利亞民主人士的合法代表，最後他們卒能公開奪取政權。此後不久，保加利亞竟判決一位偉大的抵抗運動領袖即社會主義者 Petkov 的死刑，輿論震驚，至少在我國如此。

在匈牙利，共產黨的技術不僅在使其黨委担任全國重要職位，而且以紅軍為掩護滲入他黨內部。社會民主黨在恐嚇與欺詐之下與共產黨合併，雖經工人階級直接選出的該黨執行委員會反對，亦無效果。小個農黨拒絕同意時，蘇聯總司令部出面干涉而逮捕其書記長 Kovacs。匈牙利雖在去年秋天還有百分之八十選民投票反對共產主義，現在已經完全受共產黨的控制。

這是我們所連續見到的各個事變的過程，最後的一例是捷克政變，一切情形與前完全相同。當然，有人可以說所有這種種事變都是這些國家內自發運動的結果，其人民逐漸相信生活在少數無情者專政的極權政體下的幸福。可惜這些大變動通常似與蘇聯高級官員從莫斯科至該國訪問同時發生。這種同時發生的情形，其本身就足以引起我們的猜疑，我當然不會認為共產黨員除了這種公開訪問以外就沒有與莫斯科保持密切聯絡的機會了。共產黨的顯然由外國支持的陰謀與滲入，經常都是在秘密中工作。就捷克而言，前次[第二六八次]討論這個問題的會議中和今天都已引述國外貿易部新部長的聲明，他說“我們卒能擊敗反動勢力，必須感謝我們的斯拉夫盟國，主要的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後來我查明這種說法與捷克的官方新聞社發出的第一次報告相合。隨後該社發表一項更正，將這一段刪略了。

過去幾個月內，自從馬歇爾計劃開始以來，莫斯科似乎已發令加速步調。我們每天聽到共產黨人在希臘境內用殘暴方法，逼迫農民參加共產黨運動，要不然就把他們逐出山村，使他們成為無家的難民。全世界都知道這是一種故意採行的政策，其目的在求希臘一般民衆受饑饉之虞，並且造成困苦與混亂情況以致希臘軍隊的戰鬥精神完全崩潰，藉以征服希臘。可是人人知道希臘人民比以前更能團結一致地反抗這種共產黨的侵略，而且狂妄的過激分子祇屬少數，他們若沒有北鄰諸國的協助、支持與武器，連一個月也不能維持。我們知道現有關於援助義大利共產黨員奪取政權的種種準備，過去幾星期內義大利政府已經搜獲正由南斯拉夫運給義大利共產黨的武器。

捷克國內最近政變是完全照一貫的共產黨技術進行的。大家都知道各國共產黨聽從莫斯科的命令，據去年十月國際共黨情報局宣言所稱，該局已調整若干歐洲國家（捷克也在內）的共黨活動，蘇聯是該局的創始者與主動者。各國共產黨去年九月在波蘭舉行的會議決定設一情報局，其任務經明定為“辦理各國共產黨交換經驗事宜，並於必要時，根據相互的協議調整其工作”。

從其他各國所得到的這種證據使我們對於日前捷克發生的事變有什麼更清楚的認識呢？人人都知道捷克人熱誠相信議會的民主。兩次大戰期間，他們的議會代表所有各派人

民。其工作之順利，不亞於任何國家，任何議會亦不能給所有各派人民以更大的繁榮與社會進步。Benes 總統回到捷克時，他是自由民主的象徵，他就是從這種自由民主得到力量。他經過長久流亡歸去後，受到熱狂的歡迎，一切情形證明他受到絕大多數人民的擁戴。在他的領導下恢復了自由的捷克議會，並有自由的工會，而且新聞、言論、思想及寫作都有完全自由。Masaryk 本人時常誇言捷克國內沒有鐵幕，從外國來的人士都能與所有報界來往，隨意發表任何言論，他們的言論都自由地向全國報導。或者共產黨預料他們在將來的普選中所得票數比上次普選時所得票數差得遠，因此當然就如此急迫地進行革命的改變。

我們能相信捷克人民會自願地取消他們自從擺脫奧地利帝國的統治以來所如此珍視的民主自由嗎？我們能相信像捷克人那樣的英勇民族，他們曾對納粹作如此壯烈的抵抗，他們的飛行人員在不列顛戰爭中曾擔任如此重要的工作，假如沒有受到巨大壓力的威脅，竟會放棄他們的民主權利嗎？

倘捷克人民自由地接受了這種改變，他們的偉大民族領袖，Benes 總統和 Jan Masaryk 就會告訴全國何以需要改變的理由，就會請人民接受改變，就會出面領導全國真正同意這種改變，這一點還用懷疑嗎？然而，Benes 總統和 Mr Masaryk 究竟採取了什麼行動來使全國一致支持這種改變？Jan Masaryk 作了最後絕望的犧牲，他犧牲生命向全世界證明這種改變是強迫他的國家接受的。Benes 總統至今對於捷克人民或全世界尚未發表任何宣言，同時新捷克政府的宣傳力求人民相信西方國家已表現出它們是捷克敵人的真面目。這些話自然是最不合事實的話了，我深信這次事變決未減少英國人民對於捷克人民的友誼。這當然是我們所看到在東歐其他國家內，尤其在蘇聯本國內慣常用以煽動國際仇視的方法。

最後，我願意簡單評述安全理事會以前討論中所提出的一點。有人向我們說縱令可以證明真有違犯憲章情形，這種違犯若不威脅到對於國際和平及安全的維持，即不屬於安全理事會職權範圍內事。我對於這一點表示懷疑，我願意指明憲章第二十四條將“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責任”授予安全理事會，繼而規定“安全理事會於履行此項職務時，應遵照聯合國之宗旨及原則。”因此，我

覺得實難相信聯合國一會員國若經發現違犯了憲章中某一重要原則，安全理事會可以認為這事與它無關。

可是縱令我對於這一點的見解是錯誤的，我仍然認為就本案而言，如果已經證明真有違犯憲章情形，那就可以構成對於國際和平及安全的威脅。在美國總統於三月十七日向國會演說以後，無須再來評論這個問題，假如再多說也許可以算得狂妄。可是這種趨勢的發展必須有一個限度，過此限度即須加以阻止。全世界差不多人人都熱誠希望以和平方法阻止這種趨勢的發展，可是這個希望或者不能實現，這一點是不能否認的。

我們決斷這件事時必須留心，審慎而且客觀，尤其要注意不要輕易受人蒙蔽。

Mr TARASENKO（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雖經我們反對，安全理事會仍然討論智利代表來函。無論願意與否，我們不得不注意這個非常卑鄙和最富誹謗性的文件。

Mr SANTA CRUZ（智利）安全理事會既依照憲章第三十一條規定邀請我來參加工事會的討論，我想我與理事會所有理事一樣有權受到保護，任何人均不得對我用無禮言語，亦不得侮辱我。

因此，我正式請求大家表明理事會擬如何保護敝國的權利以我身為聯合國代表的權利。要不然，我們大家都應清楚知道我們對於某些國家及其領袖與代表表示我們的意見時是否可以隨意自由選用形容詞。

我並不窮於形容詞，我也並非不願意選用。

Mr GROMY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我們應該請智利代表不要插言。

主席 我聽完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的言論的法文和英文傳譯以後即討論智利代表所提程序問題。

Mr TARASENKO（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我不庸誇張智利之提出這個問題是一個重要舉動。無疑的，智利政府本身也不知道它究竟希望什麼，它由此舉可以得到什麼結果。我也不擬詳論像前捷克駐聯合國代表這種人的幼稚的誹謗及其提出的所謂事實與結論。他背叛他的國民決不會是偶然的，也決非祇在過去幾星期內才開始的。我主要注意的是其他事實以及強迫把這個問題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其他力量。我們可正當地詢問那些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個問題者的動機為何。我認為這種動機非常顯明，我們不會對

它有兩種見解。有些國家的某類人士唯恐其直接參加捷克反動派陰謀之事為人所知，於是趕快力求妥協之道詆毀那些卒能預防捷克陰謀者的罪惡計劃而使其不能為害的勢力。

二月尾捷克報章發表著名新聞記者Andre Simon的一篇文章，其中引述種種事實證明美國和英國某些方面干涉捷克內政。從這位新聞記者所報導的事實顯見這個陰謀的線索牽連到華盛頓與倫敦。André Simon說，在捷克境內的秘密罪惡運動組織中特別活動的是前任美國駐莫斯科及巴黎大使 William Bullitt。”作者並列舉事實證明陰謀者與歐洲聯邦運動及其領袖 Winston Churchill 亦有聯絡。陰謀者與英國工黨的重要領袖也有聯絡。

“英聯王國、美國及法蘭西擬討論德國問題的倫敦會議日期決定時”這位記者說，“外國和國內的反動派都認為捷克的政變應在這個會議閉幕前發動。這些反動派恐怕捷克人和斯拉夫人會因這個會議將造成德國威脅的再生而人心大惶，如此則公開贊成反動派叛亂計劃的國家主義社會黨的勢力即會削弱”。André Simon 繼稱，“接近 Bullitt 的人士宣言甚至於在三區會議結束以前，Gottwald 政府即會崩潰。二月下半月內華盛頓、巴黎及倫敦三地開始普遍傳佈謠言說 Gottwald 政府即將崩潰。布拉格有一個拉丁美洲的外交官得到他的外交部通知說華盛頓高級人士都在想 Gottwald 被推翻並在捷克成立一個反共政權。”可是，到了最後的一刹那，國內外陰謀者的計劃都被推翻了。大家都知道捷克共產黨對於破壞這種計劃負有決定性與領導作用。這當然會引起有支持與組織捷克陰謀者並寄以希望的一部人的憤怒因而他們對該黨不斷地加以誹謗。

那些指控蘇聯干涉捷克內政的人希望轉移其本國輿論的注意。真正干涉捷克內政者應在其他方面尋找。蘇聯與此事毫無關係。蘇聯軍隊將捷克從德國佔領者解放出來以後早已撤離該國。捷克人民可完全自由決定其本身命運，選擇其本身的政治與經濟發展途徑，事實上他們已經選擇了這個途徑。

沒有人能否認捷克人民所信任者正是共黨以及那些為該國經濟及政治生活的民主理想而工作的民主人士。

共產黨就黨員人數及對人民的影響而言，已成為捷克國內最廣大的民衆黨，這決非偶然的事。該黨首領主持捷克共和國政府

的事實，證明該黨與捷克人民的深切與不可分離的關係。

現在有人大聲喧嚷所謂捷克境內的共產黨政變。我們實難想像何以一個政府黨，領導着政府並在議會與人民有極大勢力，會發動一個反對它自己的政變。事實證明適得其反。其他黨派內有少數冒險分子，蔑視其本黨公意並得外界援助，企圖發動政變要把一個業經人民與憲法授予合法權利掌理及領導全國事務的黨趕出政府。這種陰謀未能成功，陰謀者失敗後他們的假面具被揭穿了。他們的外國保護者與領導者的假面具同時也被揭穿了。這豈不是美國和英國政界感到驚愕而決定以所謂共產黨政變為煙幕來掩飾其參加真正的而非據稱的陰謀背叛捷克人民的事實的理由嗎？

美國和英聯王國現正作重大努力以求成立西歐各國軍事集團，其主要目的在對付蘇聯及其他東歐民主國家。在這種計劃中捷克佔一個重要地位。他們原以為捷克反動派所謀劃的政變可以成功，成功以後捷克即可列於反蘇集團中。由於及時發現這種陰謀，那個擬將捷克拉入西歐反蘇集團的計劃就失敗了，而且確定地失敗了。因此，這個計劃的主動者感到無限憤怒與失望，自不足怪。他們現在惟有發洩他們的憤怒與失望並且設法誹謗那些破壞其計劃的人而已。在這種情形下，為什麼不設法利用安全理事會呢？於是安全理事會就收到智利的信。

目前美國正在討論一個所謂馬歇爾計劃——一種遠大的經濟及政治計劃。如果不能使國會相信這個計劃之合理，那末就可以想像到要使廣大民衆信服該是如何困難，這種所謂捷克共產黨政變的誹謗故事難道不是要造成必要的政治效果嗎？美國對於他國內政的干涉情形日益驚人。這種情形引起世界輿論及美國人民中進步分子正義的憤怒。所謂蘇聯干涉捷克內政的虛構故事，其目的在求將輿論界的注意力轉到錯誤的方向。事實上毫無證據證明蘇聯干涉捷克內政，但有充分證據證明美國直接干涉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內政，這種干涉簡直是公開無忌，令人髮指。

在這方面我應該提到美國對於西歐各國的所謂經濟協助。我們聽到和讀到不少言論，其目的都在表明這種協助是美國的正直無私與特別利他精神的表現。我們不斷聽說這種協助毫無政治目的，對於接受美國經濟協助的國家沒有提出任何直接或間接威脅其國家

主權的政治要求。然而，言語與事實是兩件不同的事。協助計劃尚未實施——誰知道什麼時候實施？——但已在強迫西歐各國償付債務了。這是意料中的事。美總統的外援委員會報告書說

“但美國在歐洲的利益不能祇以經濟來衡量，而且也有戰略與政治利益。”

因此，這不是美國方面的單純利他主義，目的祇求儘速協助困苦的鄰國。事實完全不同。如果我們談到美國的利他主義，也許應該引述法國報章上最近登載的一段

“金元外交已開始其枯竭西歐各國經濟的工作，以便於其經濟全被破壞時，即生活程度降至最低限度時，這些國家就可成為剝削的區域。那時藉政治力量之助即可能使西歐所處情況與中南美若干共和國的處境相同。”

許多事實證明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這裏有幾件事實。

現以希臘為例。安全理事會中對於這個不幸的國家已經談得很多。歐洲境內和美國國內有許多人都說希臘可老實稱為美國的外府。希臘人民所受的血浴是無止境的。希臘境內成千成萬的男女老幼都在哀泣他們的父親、丈夫和兒女的死亡，他們的鮮血染紅了希臘劊子手以及其他屠殺者的手。美國報章最近宣布美國駐希臘代表 General van Fleet 曾公開要求槍殺希臘民黨人士與共產黨員，希臘的刑吏馬上服從，無須 General van Fleet 重複他的命令。這難道不是一個外國公然干涉另一國內政，幫助賣國賊與劊子手蹂躪人民的一種干涉嗎？

美國的政客時常發表聲明以求世人相信美國祇希望將希臘從經濟混亂中拯救出來，可是他們完全不提事實上這種混亂是英國和美國在希臘跋扈操縱的結果。美國運到希臘的極大部分物品都是毀滅希臘人民的軍用品，怎麼會不發生這種情形呢？在這種情形下，無怪乎今日希臘的經濟情況比德國人離開時還要壞許多倍。

例如，一九四七年五月內鎳產量為戰前水準的百分之十三，金屬產量為百分之二十五，水門汀及建築材料為百分之三十二，牛油及人造牛油為百分之十五。

若把這些數字與其他證明捷克的經濟復興的數字作一比較，將不是沒有意義的。在捷克執政的就是美國反動派所指責犯有一切嚴重罪惡的共產黨代表。

一九四七年年終時工業出產總額超過一九三七年水準百分之十，而有些工業部門則超過百分之四十。捷克的工業產物運至許多國家。這些國家把工業原料和民用物品運至捷克作為交換。這是何等驚人的對照！希臘現在受通貨膨脹的窒息，自不足怪。人民失業情形已達空前紀錄。人民普遍饑饉度日。我們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幾不能看到今日希臘所有的貧苦景象。

這是英聯王國和美國干涉希臘人民內政的結果。那些支持智利的人為什麼不要求把美國和英聯王國干涉希臘內政的問題列入安全理事會議程？

義大利是美國干涉他國內政的另一例證。許多美國報紙及政界聞人隨意想像說捷克共產黨的政策完全在於維護蘇聯的利益。捷克人民的想法就不同了，因為事實表明捷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得極好。我們能說義大利的政府領導人物也是如此嗎？可惜不能。可惜義大利人民有充分理由認為這些政府首要人物是美國的僕從而不是人民利益的保護者。最近美國與義大利締結臨時經濟援助協定以及友好、商務及航行條約。其結果許多義大利公司，其中例如 Fiat, Breda 及 Farelli，都遭遇不可避免的破產命運，因為美國的賤價貨物充斥義大利市場。義大利政府依照美國代表的指示，在信用貸款方面，供應量短少的原料的分配及銷售等方面對義大利公司處處為難。最後這些公司不得不停業而解僱其工人。這種情形之發生正值義大利的出產尚未達戰前水準的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而失業工人却超過二百五十萬人。實在說這種情形對於美國的某些商界非常有利，因為例如一九四七年美國產品的輸入超過義大利全部輸入品的百分之五十八，而在戰前僅達百分之十一。

美國的目的在求破壞義大利的工業，而義大利政府竟會同意這種計劃。在這種情形下，來函煽動者智利為什麼不切望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美國干涉義大利內政的問題呢？

目前義大利正在籌備於四月十八日舉行的國會選舉。美國有些人士公然表示他們恐怕左派各黨，即保護義大利人民利益而非保護華爾街利益的各黨，在選舉中有獲勝的可能。若干政府已在採取種種辦法以求消滅義大利會有不如其意的選舉結果的可能。

美國商界消息靈通而有勢力的人士所辦雜誌商務週刊於三月初登載一篇文章論即將

舉行的義大利議會選舉。這篇文章說“義大利是美國的領土，由於美國的主動去年 De Gasperi 驅逐了內閣中的共產黨員，美國並決定保持這種主動地位”。談到美國可能對義大利的壓力，作者繼續說“美國的一枝日益強大的海軍艦隊正停泊於義大利沿岸，美國正沿北非海岸建築空軍根據地。”這個雜誌承認義大利人民可能會選舉左派各黨，同時問道“那麼，美國怎麼辦呢？”接着毫不猶豫地回答道“首要目標在以政治及經濟壓力影響義大利的選舉結果。”“如果失敗了呢？”作者又問，並回答說“今日華盛頓並非絕對不用軍事干涉。如此就說不定會發生戰爭。”這個雜誌很有勢力並且反映權力方面的意見，它直言不諱稱美國商界與政界認為義大利是美國的領土，說美國應該不顧一切，包括戰爭在內，勇往直前阻止左派各黨在將來義大利議會選舉中獲勝，縱令這是義大利人民的意願。這就是美國不干涉他國人民內政的真面目！

既然如此，無怪乎義大利報章宣布美國正在計劃於選舉前夕運送三萬架機關鎗與二十萬支來福鎗到義大利，以期阻止可能發生的任何擾亂情形。這些美國人現在高叫蘇聯的影響和蘇聯干涉捷克內政，同時他們却毫無顧忌地把許多國家逐一變成他們的被保護國，他們是何等的偽善！何等的表裏反覆！在安全理事會中提出捷克問題乃是對於義大利選舉的許多計謀之一，這一點是無疑義的。這種企圖的目的在求以反蘇誹謗所造成的大聲疾呼來影響義大利的選舉結果。

我祇舉出了兩國為例。歐洲、亞洲和美洲許多國家都有這類情形，可是我要等以後再談這個問題。目前我祇擬表明美國之干涉他國內政已成為一種國家主義。門羅主義，就大家以前所瞭解的意義而言，現已成為古代歷史。三月十日阿根廷 El Lider 報——這不是共產黨報紙，而是反映一班接近政府的人士的意見的報紙——論述門羅主義在今天是什麼樣的。這個報紙不得不悲傷地宣稱外國資本在拉丁美洲國家的優勢“已在拉丁美洲各國造成種種困難的對內對外政治問題。讓予辦法已使這些國家遭遇大國干涉其內政的事實。”繼而談到波哥大美洲國際會議將於三月討論的美洲國家自衛理事會議，這個報紙說“這個會議行將討論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成立一個包括全美洲的最高國家，其首都將為華盛頓”。該報指責美國設立各種美洲機關，並藉此等機關之助以求“保證資本主義的統治

並且肅清一切障礙以便增進美國的工業、商務及政治利益”。該報最後說“擬設的這個最高國家，其所有的經濟、軍事及政治權利與新世界每一個共和國國家主權的原則都不相符合”。

這是門羅主義的現實情形，這個主義的原意是保護美洲大陸國家不受大西洋彼岸國家的干涉，可是事實上它現在已經造成了美國可以獨吞整個美洲大陸的情勢。

美國對於所謂干涉捷克內政之事大肆喧譁，我們覺得美國必須作這種喧譁以求世人不注意美國實際干涉歐洲、亞洲和非洲許多國家以及美洲大陸各國的內政，這一點實在非常顯明。現在美國反動派每次看見世界任何角落有任何國家拒絕服從他們的命令或者有一國或一個民族認為國家及民族主權原則神聖不可侵犯，他們即認為這是對他們的利益的一種威脅。今日美國政治家或政客的代表人物就是 Mr Dulles 這位先生，根據他的政治哲學，現代所有種種困難與不幸事件都是由於各國各有主權的緣故，這種主權必須終止，而且應該儘速終止。

我們應該注意 Dulles 的理論祇在為美國過去的行爲供給理由。智利所虛構的全部故事，其目的不是祇在掩蔽美國干涉世界上許多國家內政的慣行以及美國現在採行的擴展政策嗎？捷克政府中少數有罪的陰謀者已被逐出，這件事使美國政府非常不高興。美國政府認為如此即有重大與充分理由稱捷克為不民主的國家。捷克人民絕大多數贊成政府的行動並且表示對於政府的信任，這個事實美國政府視為無足輕重，它堅稱捷克現時政體不合美國的民主標準，因此應該在安全理事會中加以討論。可是美國國內一千五百萬黑人的特殊地位是代表那一種民主標準呢？私刑法是不是民主法典中不可缺少的條款呢？

所有對於捷克最近事變的喧嚷及所謂蘇聯參加這種事變之說，所有對於東歐各國內無民主的假淚，都祇在求世界輿論不注意美利堅合衆國的現行政策，與這種政策的性質與一貫性是大家清楚知道的。

智利來函祇是許多國家內反動派用以束縛其本國人民意志與思想的鎖鏈之一環而已。這是智利來函的唯一重要性。

主席 智利代表所提出的程序問題不屬於議事規則範圍，而是關於安全理事會中詞令的標準問題。我覺得各理事本人當願意時

時保持相當尊嚴與禮貌，不特彼此互相尊重，且尊重參加理事會的各會員國政府。在我看來，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的言詞並不低於我們願意保持的通常詞令標準。

Mr ARCE (阿根廷) 我不願討論這個問題的實體，可是剛才提出的一點或值得我們注意。

關於主席剛才所作決定，我願意表明假如大家不強迫阻止我，我願意依據安全理事會臨時議事規則第五十二條規定請速記員刪略烏克蘭代表所用“卑鄙的文件”等字。

智利代表是我們請來參加理事會會議的。我們不能因為他沒有各理事所享受的權利，不能為自身辯護，就不正直地利用這一點來侮辱他或他的政府。用這種言語——這還不是第一次用這種言語——會引起一些代表要求在這個理事會會議室中裝置一個抽水污物盆，於必要時可沖淨所有污濁不潔之物。我希望我們不致如此。

我現在願意簡述烏克蘭代表所提到的阿根廷報章上的一篇文章。除非我的記憶錯誤，我可以說他引述這一段的目的決非無瑕疵的。

烏克蘭代表說在倍諾斯愛勒出版且與政府方面接近的 El Lider 報評論外國資本在國內所造成的種種困難。

因此，縱令對於這個“強的政府”和“強人”有種種說法，阿根廷境內畢竟有言論自由，於是倍諾斯愛勒報紙即能對外國資本所造成的困難表示意見。因為假如接受外國資本，即須還本付息。然而，El Lider 並未提到其他接受大量款項而其政府並不注意還本付息的國家。

Mr SANTA CRUZ (智利) 我祇願表示感謝主席所說的話並感激阿根廷代表。

無論如何，顯明的，安全理事會不能保護其理事的不受這種侮辱的權利。為了對理事會表示敬重並且鑒於理事會的尊嚴，我將盡力避免用這種言語。

可是我願意表明我並不習慣於任人侮辱我自己或容人侮辱我的國家。

主席 現在時間已經不早，我提議我們休會到明天下午再討論。原定在明天下午討論的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延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四討論。

(午後六時三十分散會。)

	頁次
第二百七十次會議	
二五。臨時議事日程	62
二六。通過議事日程	62
二七。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62
第二百七十一次會議	
二八。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68
第二百七十二次會議	
二九。臨時議事日程	76
三〇。通過議事日程	76
三一。繼續討論智利常任代表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事件之來函	76
第二百七十三次會議	
三二。臨時議事日程	90
三三。通過議事日程	90
三四。繼續討論智利常任代表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事件之來函	90
第二百七十四次會議	
三五。臨時議事日程	101
三六。通過議事日程	101
三七。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01
第二百七十五次會議	
三八。臨時議事日程	107
三九。通過議事日程	107
四〇。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07
第二百七十六次會議	
四一。臨時議事日程	111
四二。通過議事日程	111
四三。繼續討論智利常任代表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事件之來函	111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 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H A Goddard 255a George St Sydney
90 Queen St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Carlton N 3
Victoria

奧地利

B Wulle stc 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Gerald & Co Graben 31 Wien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 A
14 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W H Smith & Son 71 75 boulevard
Adolphe Max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i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io de Janeiro Sao Paulo
and Belo Horizonte

柬埔寨

Papeterie-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or
tail 14 Avenue Bouilloche Phnom Penh

加拿大

Ryerson Press 299 Queen St West
Toronto
Periodica Inc 5112 Ave Papineau
Montreal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The Associated
Newspapers of Ceylon Ltd P 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Libreri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Editorial del Paci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中國

臺灣, 臺北, 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哥倫比亞

Libreria América Medellín
Libreria Nacional Ltda Barranquilla
Libreria Buchholz Galería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Trejos Herman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洛伐克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ida 9 Praha 1

丹麥

Ei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o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i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
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ia Cientifica Guayaquil and Quito

埃及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國

Editions A Pe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

德國

Elwert &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 Schöneberg
W E Saarbach Gereonstrasse 25-29
Köln (22c)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
baden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ens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Boite postale
111 B Port au Prince

洪都拉斯

Libreri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Jakarta

伊朗

Ketab Khaneh Danesh 293 Saadi Ave-
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Ltd 35 Allenby
Road Tel Aviv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日本

Ma uzon Company Ltd 6 Tori 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黎巴嫩

Libra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利比里亞

J Momolu Kamara Monrovia

盧森堡

Librairie J Schummer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 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 F

荷蘭

N 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 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
land C P O 1011 Wellington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
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omas & Thomas Karachi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and Chittagong (East Pak)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Plaza de Arango Pan-
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i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 A
Lima and Arequipa

菲律賓

Alemar's Book Store 74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186 Rua Aurea Lis-
boa

新嘉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i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ia Mundi Prensa Lagasca 38 Ma-
drid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 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 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敘利亞

Librairie Universelle Damas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Box
724 Pretoria

英國

H 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669
London SE 1 (and at H M S O Shops)

美國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
bia University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 Elia Av 18 de Julio 1333 Monte-
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i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lipán Caracas

越南

Papeterie 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or-
tail Boite postale 283 Saigon

南斯拉夫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

Sales and Circulation Sec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 S A ;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OR/SC/3rd Year (No 36-51)

Printed in U S A

Price \$U S 3 00, 22/6 stg, Sw fr 13 00

C P -55-32149-Nov 1956-121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